

体育论衡

——实践之思与理论之辨

谢雪峰 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体 育 论 衡

——实践之思与理论之辨

谢雪峰 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 李 建
责任编辑 曾凡容
审稿编辑 李 飞
责任校对 雷 蕾
责任印制 陈 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体育论衡:实践之思与理论之辨/谢雪峰著.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8.6
ISBN 978-7-81100-977-4

I. 体… II. 谢… III. 体育-教育-研究
IV. G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2570 号

体育论衡:实践之思与理论之辨 谢雪峰 著

出 版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
网 址 www.bsup.cn
邮 编 100084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北京市昌平阳坊精工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

200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900 册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因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博士生导师朱九思教授、硕士生
导师郑孙谦教授、国外访学导师鲍·阿·
尼基丘克教授。

我先后求学和服务的武汉体育学院、
俄罗斯国立体育与旅游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北京体育大学。

作者简介



谢雪峰，男，湖北应城人，1950 年出生。教育学博士，现任武汉体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亦被聘为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谢雪峰下过乡，做过工农兵学员，当过中学教师，在武汉体育学院读研留校而开始高校教师生涯，至今已近 30 年。其间曾受当时的国家教委派遣到原苏联中央体育学院访学和研究，在原华中理工大学攻读高等教育学而获博士学位。高校任教以来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 70 余篇，出版专著、教材 8 部（有些与人合著），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曾获多项科研奖励。

序

田麦久

《论衡》，东汉王充之著作。夫“论衡”者，铨“轻重之言”也，亦可引伸为对事物或问题的解析与论证。作为人类社会重要活动之一的“体育”，确实有许许多多的现象需要解析，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研究。谢雪峰教授《体育论衡》一书，即是对体育中若干重要现象与问题的解析与研究。

半个世纪来，谢雪峰下乡插队，推荐考学，中学任教，读研留校，学术探索，跻身管理层工作，经历了丰富的人生。他练过乒乓球，研究过人体和教育；教过中学生的体育、语文和数学以及大学生的运动解剖学，正在教研究生的高等体育教育学。多彩的生活经历给了他广阔的视野，时代的发展给了他跃动的思维。《体育论衡》中近 30 篇专论涉及到了体育理念与体育法学、高等教育与高等体育教育、体育竞技与体育生态以及运动人体科学等诸多领域，映射出作者对于社会、对于体育的密切关注，展示出作者丰厚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充盈着作者对自己所钟爱的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不倦的探索精神。

在广泛涉猎体育与教育众多问题的同时，谢雪峰教授更有着他专注的研究方向，就是“体育高等教育”。因此，他的《体育论衡》主要集中在体育教育的维度上展开研讨和深入探索的。在“教育理论篇”中，他阐述了体育高等教育的整体性与层次性，论衡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价值；在“教学实践篇”中，他收入了自己对高等体育院校的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博士生培养等诸多专题的研究论文。

这些专论，总结了他任职于武汉体育学院教务处、研究生部、教育研究所丰富的工作体验，也融汇了武汉体育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的丰硕成果，是我国体育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宝贵财富。

我与雪峰教授相识多年，在他担任武汉体育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处长和研究生部主任 15 年的历程中，常常在多种场合一起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他待人谦逊有礼、思维敏捷深刻、论述清晰简明，每每给人以深刻印象。读他的文章，给人以启迪；为他的书作序，是我的荣耀。

2008 年 8 月 8 日，第 29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圣火将在北京点燃，那将是中国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当然，更是中国体育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在北京奥运会大幕拉开的前夕，谢雪峰教授《体育论衡》的出版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我仅在此向雪峰教授表示真诚的祝贺，并期待着他新的研究成果。

2008 年 1 月

自序

2008 中国奥运年，恰是我个人体育教育生涯的第 35 个年头，这本《体育论衡》就记录了 35 年来我的某些学术探索。书名曰“论衡”，意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著作《论衡》之《对作》篇目，其中有言：“故论衡者，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我也曾想，用这个书名会不会胆气太大了点？但从书中对体育几个相关领域的理论思辨和实践探讨来看，实在也是衡轻重、辨真伪、究宏微，好象可以说得过去，不妨立此存照。35 年似乎只在弹指之间，其中涉及我学术经历的许多记忆挥之不去，而且也想与人分享。然则记忆画面如何“播出”？不由想起报章频见的“转型”一词。经济可以“转型”，社会可以“转型”，个人也可以“转型”。尽管“转型”可能已被滥用，但此处再“滥”一次料无大碍，故而就以自己人生中称得上“转型”的某些片段为线索，引出我与体育教育及体育学术和教育学术的不解之缘吧！

结缘体育：从插队知青到工农兵学员

1968 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似乎出现了一丝接近尾声的迹象，“文革”舵手毛泽东同志指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当时我是湖北一所省属重点高中的 1965 级学生，虽然在高中上课的时间只有年余，但也算是“老三届”中最低一届即 1968 届毕业生，理所当然地需要接受“再教育”。1968 年底我结束中学生活，之后插队到了江汉平原一个湖区的村子。我从进初中起就一直做着将来上北大、清华的梦，1966 年国家宣布停止高考时此梦淡出，这次感觉则是彻底梦碎。好在村子里无论贫下中农，还是“四类份子”，对我们知识青年都还不错。几年下来，从不知“秧马”为何物到栽秧割谷的一把好手，从煮面不知何时放油到能做农村请客的一桌酒席，从农田水利工地的民工到公社中学的代课教师，我“接受再教育”生涯确实收获良多。然而从 1970 年起，我所在公

社和区里的插队知青，一拨拨进城当工人，一批批到部队当兵，一个个进大学读书，我则一直坚持平时教书、农忙种田。我所在知青小组共6人，1970年开始走人，到1972年就只剩我一人形单影只。不是我风格高礼让别人，而是领导不推、有人不要。我父亲“文革”中作为正式选中的“叛徒”被监督改造，母亲作为备选“叛徒”在干校劳动，我岂能谈什么“高风亮节”？父母亲的处境直到1974年之后才逐渐好转，但这已是后话。

1973年的夏天，我的命运忽然有了转机，大队、公社和区里都把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列入了推荐上大学的名单。到县里来招生的省内外大学共有几十所，我去找了一些招生老师介绍自己情况，但最后被告之只有武汉体育学院愿意考虑。武汉体育学院当时在我们县里招生的是韩绍相老师，我没去找过他，但他见了名单后找到我并告之我考得很好，数学100分、作文评分也最高（当时我们参加书面考试就两门，“白卷英雄”张铁生的考试也在那一年），我们准备录取你。然而事情一波三折，先是县里某军管领导反对，后又传主管招生的县文教局某人作梗。但武汉体育学院的韩绍相老师和负责整个地区招生的袁以信老师力排非议，使我最终得以录取，成为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系1973级的工农兵学员。

中学时代的我虽爱好乒乓球、篮球、游泳等运动，还曾参加过湖北省第一届中学生运动会，但从未想过要以体育为终身职业，因为当时我最有兴趣且成绩最优秀的是理科。经过“文革”插队和招生的这段经历，我与体育正式结缘，至今已然30多年，这虽不是我的初衷，但我自感受惠多多。而且一路从对体育无可选择地进入到十分喜爱地投入，最后竟至无法割舍地融入了。我经常回想当年，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袁以信老师、韩绍相老师与我素昧平生，但他们坚持自己的看法，给予我很大的信任和关爱，实在是极不容易的。袁以信老师几年前已退休，韩绍相老师二十年前就已调往外地，我一直将深深的感激埋于心底，甚至都没对他们说过什么感谢之语。

二进武体：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教师

1972年~1976年，武汉体育学院所招学生的学习年限均为三年，当时绝大多数高校也都如此。时间虽比现在的体育专业本科少一年，但当时学员们抓得很紧。1973年，武汉体育学院招生只有600多人，但节假日和课后运动场往往不够用，教室和图书馆也往往不够坐，大家学习积极性很高。三年过得很快，按照“社来

社去”的分配原则，1976年我毕业仍回到原来下乡插队的县，在县第一中学当体育教师，这一做就是三年。其间除了教体育课之外，还兼过高一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和初三年级一个班的副班主任，同时，因班级任课教师请长期病假，代过高一语文课和初三数学课各一学期。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但还没建立学位制度，因此当时研究生招生只有专业之别而无硕士、博士之分。母校武汉体育学院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时只有田径、武术、体操、排球教学与训练等几个专业（当时称专业而未象现在定之为方向），1979年只有篮球和运动解剖学两个专业。我在体育系学习的三年中专选项目是乒乓球，故而考母校的研究生就希望有乒乓球，这样轻车熟路。但当时听说乒乓球教师招研究生可能还要等几年，于是1979年我报考了母校的运动解剖学。据说有不少人报此专业，但经过初试、复试，最后只有我一人被录取。专业考第一本该高兴，但我当时非常失落，同一专业学而无友令人倍感孤寂。好在同年级还有篮球专业的几个研究生，我们相处融洽、互相帮助。尤感幸运和欣慰的是，导师郑孙谦教授不仅在治学方面予我诸多启迪和教诲，而且生活中也对我非常关心。研究生管理部门的领导、教研室其他老师和其他任课老师也对我指导很多，同时各方面给予关照。我的硕士学位论文（1981年国家设立了学位制度，毕业论文也就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做出来的。说来有趣，我的论文先是在武汉体育学院进行过一次正式答辩（当时还请了医学院的两位教授做评委），然后还要到上海体育学院去申请硕士学位，因为武汉体育学院当时还无相应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上海体育学院欣然接受我的申请，并提出先考外语而后参加论文答辩。我没有退路，只有前行。我的外语是俄语，据说考试用的是复旦大学的相关试卷，我有幸也许是侥幸考了80多分，这是我先前没想到的。答辩也很顺利，事后得知评委大都评了优秀。我很感谢上海体育学院研究生部和解剖生物力学教研室的老师们，他们一方面严格要求，另一方面也给我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实际是我大学教师生涯和学术生涯的真正起点。由于我的论文总字数在3万字以上，当时学术刊物普遍只发6千字左右的论文，故而我只好将论文内容中相对独立的几块再作加工，先后在几家刊物发表。其中2篇载于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主编的刊物《人类学学报》、1篇载于上海科技大学的《生物力学》、1篇载于中国解剖学会的《解剖学通报》、1篇载于《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硕士学位论文的内容能登这些学术殿堂，给了我极大的学术自信，引领我前行。在这本《体育论衡》中，或可看到我某种学术上的努力和处世上的勉力。

梦圆华工：从运动人体科学到高等教育学

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正式开始了高校教学科研生涯。我硕士专业的正式名称当时是运动生物力学（含运动解剖学），后来又归入运动人体科学。因此，当时在教学上我主要担任运动解剖学课程，科研兴趣则主要在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力学乃至运动人体科学的大框架之下。除此之外，出于较深的“乒乓情结”和体育术科教育的整体背景，使得我还关注有关乒乓球竞赛乃至竞技理论和体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同时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探索。以上这些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的成果有的已反映在《体育论衡》之中。

1989年，我通过了国家公派出国人员的外语水平考试（俄语），于1990年被国家教委派往苏联中央体育学院（该校现已更名为俄罗斯国立体育与旅游大学）。我当时在国内已是副教授，但出国的身份是访问学者（或者也可说是进修人员），我的访学导师是苏联中央体育学院人体解剖学与运动形态学教研室主任、医学博士鲍·阿·尼基丘克教授。在那里，我除了听课外，与导师及导师所带的研究生们经常进行学术交流，也参加了一些国际、国内的学术会议，学术视野得以拓展，科研方面得到进一步历练。

但是回国不久，就接到了另外的任务，到学校教务处担任副处长，分管教务、教研、教材等工作。教务处工作任务繁重，而且带有很强的学术性，使我不得不减少本科的课程教学任务，同时期待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提高理论素养和增加实践参照。如此一来，当华中理工大学高教所招收高等教育学博士生时，我不顾自己在考生中“年事已高”，也不管我已是教授，在华工（华中理工大学原为华中工学院，在湖北简称“华工”，就是现在几校合组了华中科技大学，人们仍然习称“华工”。笔者注。）理应自己带博士生了，仍然报考了那里的博士生。所幸那里不管年纪大小、职称高低，一律按成绩择优录取，我于是走进了华工。记得我在面试时曾说，上华工是我中学时代的一个梦，当时不能实现，现在虽然“年事已高”，上华工也不能带来什么功利，但仍盼能圆这个梦。当时的主考老师有朱九思、涂又光、姚启和、文辅相、陈昌贵等几位教授，后来我师从我国著名教育家、曾经多年担任华中工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朱九思教授。但说实话，当时我只是“吐露”心声，并没“坦露”心迹。我当年大学梦的第一幕是“北大、清华”，第二幕才是“武大、华工”，恐怕自认为非常优秀的荆楚高中生，不少人都会做这种梦吧！然而进

了华工之后，我才感受到，这第二幕在许多方面并不一定逊于第一幕。不是说华工总体堪比北大、清华，而是许多方面各有特色、各有优长。比如在校园和校园文化、管理传统及水平、不同研究方向及特色、导师学术风范及人格魅力等方面，二者相比时怎一个“好”字或“次”字了得！在华工的三年多使我感觉到，并不只是实现了大学梦的“第二幕”，而是完全圆了昔日之梦。华工三年多的岁月，还使我的学术兴趣及其实践的重心自觉和不自觉都转移到了高等教育研究上来；担任武汉体育学院教务处处长、研究生部主任的实际经历又促使我将体育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融合起来，于是我提出了“体育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并于1997年在全国率先招收了相应方向的硕士生。2003年北京体育大学聘我为博士生导师，所带学生也以体育高等教育为主要研究方向。可以说，没有这些研究实践和带研究生的经历，就不可能有《体育论衡》中的“教育理论篇”和“教学实践篇”。

不是尾声：从研究生部到高教所

我在武汉体院教务处副处长、处长位置上工作了5年，在研究生部主任位置上呆了近10年。作为研究生部主任和教授以及博士生、硕士生导师，我精力花费最多最大的是学科建设，同时感受最深的也是学科建设。

我初到研究生部是1997年初，从当年起即投入到了此后多轮的申请新增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和新增硕士学位点的工作。1998年教育部批准了我们体育学一级学科下的运动人体科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硕士点，此后几轮又陆续增加了临床医学一级学科下的运动医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产业经济学和艺术学一级学科下的舞蹈学等硕士点。加上原来已有的3个点，到2006年初，我们有了8个学术性学位的硕士点以及体育硕士、教育硕士（高校体育教师班）两个专业学位的授予权，涉及教育学、经济学、医学和文学4个学科门类。申请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的工作，我校多年来十分艰难而又非常顽强地坚持着，到2003年和2005年终于有了各阶段的收获。2003年，教育部批准武汉体育学院为可以联合培养博士生的单位，当年我校即与北京体育大学开展了联合培养工作。北京体育大学2003年聘请了我校5位教授为博士生导师，并从自己的招生计划中拨给我们名额，使我校2003年就正式启动了博士生培养工作。2005年武汉体育学院则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2006年初正式公布），从此学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武汉体育学院多年申博扩硕工作得到了北京体育大学和其他兄弟院校，全国教育、体育领域

许多专家学者的关心、帮助和大力支持；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全院上下共同的收获，尤其是校领导正确决策、各学科带头人艰辛努力的结果，而我作为研究生部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之一，可说“与有荣焉”。很自然，这些工作与我的学术活动互为支撑而相得益彰，种种痕迹在《体育论衡》中也可以找到。

2006年下半年，学校中层干部轮岗，我来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以前在校内也曾兼设过，但单独成立高教所也算是学校的开创吧。由此我从高校中所谓的行政、教学“双肩挑”人员，自谓转型成了教学、科研“双肩挑”人员。但这不是终极转身，目前至少不能算是完全的“解甲归田”，教学和科研之路还会再走一程。就象演戏，现在没到终场。然而以后尾声何鸣，田归何处？不得而知。

谢雪峰

2008年春于湖望斋

目 录

序	田麦久 (I)
自 序	(I)

基本理论篇

体育三类型模式：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基本理论问题 ——兼论体育理念	(1)
体育生态研究四题	(9)
多维视野中的竞技体育特征	(36)
第 27 届奥运会拉杜坎兴奋剂事件引发的法学思考	(51)
反兴奋剂的法理研究	(59)
乒乓球赛制三问题及其理论和实践的因应	(85)

教育理论篇

试论体育高等教育的整体性与层次性	(98)
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价值	(104)
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若干思考	(109)
彼得一世与 18 世纪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	(117)
试论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122)
中国形态而苏联模式：“十七年”高等教育历程与评价	(129)

从学习到改革：中国体育高等教育与苏联模式	(147)
对苏联高等教育模式评价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兼以纪念刘一凡教授	(153)
原苏联体育院校三个特色学科及其相关课程的评述与反思	(159)

教学实践篇

体育学博士生培养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174)
体育院校学生实行学业分类管理的思路与对策	(179)
体育院校课程建设的几点思考	(183)
掌握性学习策略与教学管理对策	(187)
略论我国体育院系艺术类专业的学术生态与发展模式	(192)
运动处方教学对听觉障碍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199)
运动解剖学新教学体系构想及试验	(206)
运动解剖学课程概念教学中存在问题的探讨	(213)

人体科学篇

人体感觉与竞技运动简论	(218)
人体运动与胫骨形态及其力学特征关系的实验性研究	(249)
运动人体科学与气象科学的联系及其边缘研究	(270)
运动人体科学诸学科某些共性和联系的初步探讨	(276)
运动员心身疾病患病率及其项群分布特点	(281)

基本理论篇

体育三类型模式：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基本理论问题

——兼论体育理念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人们对体育分为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等三大类别的观点已经基本认同，少有人公开质疑。但当我们对这种业已固化的分类模式进行深入研究时，许多疑问却挥之不去：这种分类的标准是什么？三大类别之间有许多相互重叠的部分，应做何解释？如果这种分类并未反映体育的本质，那它究竟是什么？如此等等。从目前的体育理论架构来看，还未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基于此，本文力图从理论上进行梳理和辨析，希望引起学界重视，共同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省思。

虽然笔者认为体育的三类型划分模式存在许多可质疑之处，但在以下的讨论中，又不得不按此模式的命名来阐述问题。因而，文中虽用三种体育类型其名，但并不说明同意这种命名的内涵；文中采用“体育分类模式”这样的概念，也并不说明信服目前的分类方法。本文沿用这些说法，只是为了阐述作者观点、讨论现存问题的方便。

二、核心要素：体育分类模式的“盲点”

（一）“体育”的核心是体育活动

任何事物的分类，都有其赖以划分的因素和标准。为了弄清现行分类模式是否科学、准确，以及存在何种问题，需对“体育”本身进行分析。关于体育，其下位概念较多，常见的有体育活动、体育思想、体育体制、体育机构、体育文化、体育现象等等，但体育的核心所指是体育活动。如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著的《体育之研究》认为：“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可言者也。”^[1]这里将体育解释为人们自身从事的科学的健身活动。而1998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则认为：“在中国，体育的广义含义与体育运动相同，它包括身体教育（即狭义的体育）、竞技运动、身体锻炼3个方面。”^[2]显而易见，他们都认为，体育是人类和人体的活动。

（二）体育活动的要素分析

正因体育的核心部分是体育活动，因此讨论体育分类模式必须重点将体育作为一种人的活动来加以考察。如前所述，任何事物的分类都应依据一定的因素和标准，因而讨论体育分类模式就有必要首先对体育活动的诸要素进行分析。关于体育活动的要素，目前未见之于教科书和科研文献。但作为教育活动一部分的体育教学活动，则可借用教育的要素进行分析。传统的教育理论认为，教育活动的要素分为教育者、被教育者和教育影响。教育者、被教育者不言而喻，分指教的一方和学的一方，影响的教育则是各种教具、教学条件和教材等等。而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教育活动的认识有所变化，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概念被淡化，倾向于两者均是主体，而教育活动则是两个主体间的交流。尽管如此，不影响借用教育概念对体育教学进行要素分析。对于竞技体育和社会体育活动而言，其中也有一部分教学活动，比如教练对运动员的指导，社会体育指导员对锻炼者的指导等等，这方面也可参照教育的要素分析。即对于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学校体育中含有教学内容的活动而言，其要素没有本质的差异。但是对于体育活动，无论是竞技体育、学校体育，还是社会体育的活动，其中大量的自我训练、竞赛活动以及自我锻炼和自娱自乐的活动，显然这时的要素不能是教育者、被教育者或者两个主体，活动的主体应是参与活动者本人，而活动直接所影响的客体也主要是参与者自己的身心（对观众的影响